

期待更多青年教師的“學術特區”

近日，浙江大學求是高等研究院公布的一條消息吸引了大家的關注：該院教師的崗位津貼將不再與其短期業績掛鉤。

而事實上，浙大對青年教師的成長開辟的“學術特區”並不僅僅如此。從2011年起，浙大求是高等研究院的兩個研究團隊迎來“5年內不考核”的“學術特區實驗”，團隊成員的崗位津貼與短期業績掛鉤，每人每年有15萬元以上的收入保障，但5年後，必須接受國際排名前20位的專家評議。

青年教師在高校教師中的比例越來越大，也是高校教研隊伍中最具潛力的隊伍，如何更好地促進青年教師成長成才，發掘他們的科研潛質，這是擺在高校管理者面前十分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。如何轉變教師評價體系、如何用國際化標準來培養青年教師、如何激勵他們取得科研成果、如何鼓勵教師按自己特長選擇不同的職業發展通道，並建立起教師分類發展的配套體系……

或許這個“學術特區”能給高校更多的啟示。

走近“千人計劃”

沙德洛夫擔任北航“複雜系統與科學工程計算國際研究中心”的首任執行主任，其團隊里現已吸納中外科學家、研究人員、程序設計師等數十名名人士。“如果取得成果，這將是計算數學中一項世界性的成就。”沙德洛夫說，我們的工作不僅要創建方案，還要培養年輕人才來應用。

沙德洛夫：希望更多的俄羅斯科學家來中國

■本報見習記者 溫才妃 實習生 劉頌賦

近日，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新主樓10層，《中國科學報》記者見到了精神矍鑠的沙德洛夫院士。

提及2011年俄羅斯宇航學聯合會授予的“加加林金質獎章”，沙德洛夫談得云淡風輕。

作為北航引進的第一位“千人計劃”學者，沙德洛夫感受到與之相融的學術空氣。他表示，“即便中方提供的條件不如‘千人計劃’，我們也能找到不止100名俄羅斯科學家願意來中國”。

“我在耐心等待未來的科學家”

與數學的因緣際會，緣自沙德洛夫少年時期的一個數學競賽，它是奧林匹克數學競賽的前身，但在當時（前蘇聯時期）還不是國際競賽。

對於少年時期的沙德洛夫，學術偶像是一個模糊的影子。

讓他念念不忘的是中學時期的數學老師多爾夫曼，現在已是一名教授。多爾夫曼老師從早到晚都在教數學，這顯然很符合沙德洛夫的求知胃口。

在剛建立的新西伯利亞科學城裡，沙德洛夫結識了許多後來很有名望的科學家，如俄羅斯科學院院士S.K.戈杜諾夫、G.I.馬爾茨克、Y.L.伊爾肖夫等人。當時他們還只是年輕的小伙子，沙德洛夫與之非常靠近。就像沙德洛夫在中國教書一樣，作為學生的他和老師從早到晚待在一起，不停地探討、爭辯，有時還會跑去老師家裏問問。

“我在知識面前表現出極大的熱情，這一點和上完課後腿就走的學生有天壤之別。”沙德洛夫因此獲得了特殊待遇——老師交代的作業比同學的難，晚上在老師家討論完問題，還會被留下喝一杯茶。“總之，老師把所有會的都傳授給我。現在，我正在努力成為像他們那樣的人。”

如今，沙德洛夫指導的3名北航碩士研究生已順利畢業。“我在耐心地等待一些未來的科學

家們，因為我知道，有些學生是以100：1的比例考入了北航的數學系。”

如果有人把沙德洛夫當做一名刻板的“學術狂”，那就錯了。閒時，他會漫步街頭，“這個時候可以思考某些問題”。倘若在家中，他還要玩上兩把電腦遊戲，近來他熱衷於一款名為“文明”的電腦遊戲，“遊戲里要統領眾多民族，這對科研機構的組織能力有很大啟示——不僅要團結各種力量，還要和敵對一方鬥爭”。

受邀“大飛機項目”

2008年是沙德洛夫赴外工作的“分水嶺”。在此之前，沙德洛夫在德國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過很長時間，一方面從事科研，一方面為學生授課。

自從1992年，中國科學院院士林祥向沙德洛夫拋來橄欖枝，沙德洛夫幾乎每年都來中國。

2008年起，沙德洛夫的工作精力更多地傾注中國。“現在我們和中方有很多有意義的事情，其他的都沒有時間意義。”

沙德洛夫口中“有意義的事情”指的是2007年3月中國政府立項的“大飛機項目”。

為了製造高性能的飛機，他們需要完善兩個方向。一是使用現成的實體飛機，利用風洞吹氣，觀察具體飛行情況。為了獲取一個成功的设计方案，需要成百上千次不成功的試驗，試驗價格非常昂貴。二是針對風洞問題的解決，沙德洛夫團隊運用全球運算速度一度最快的超級計算機天河-1A（現在被日本“超級計算機K”超越）來模擬實驗。

鑒於虛擬與現實的差距，兩套方案都不可繞過。2010年11月，北航成立了“複雜系統與科學工程計算國際研究中心”，加大大飛機項目的科研進度。沙德洛夫擔任該中心的首任執行主任，其團隊里現已吸納中外科學家、研究人員、程序設計師等數十名名人士。

“如果取得成果，這將是計算數學中一項世界性的成就。”沙德洛夫說，“我們的工作不僅要

創建方案，還要培養年輕人才來應用。”

沙德洛夫表示，“我們最終的任務是建立數字化的模式，可以在一天內设计并計算出上百個不同的方案，然後從中敲定最合適的方案變為現實。這就是我們對大飛機項目所作的貢獻”。

就在記者採訪的前一天，溫家寶總理親自接見了沙德洛夫，特意強調了北航大飛機項目的重要性，給予沙德洛夫團隊強有力的精神支持。

“中國有很好的人文氛圍”

2010年6月2日，沙德洛夫欣然在“千人計劃”聘書上簽字，聘期為5年。

對於身後的“千人計劃”，沙德洛夫認為應該拓展“千人計劃”的範圍，“當前有許多俄羅斯科學家寄希望去歐洲進行一些系列講座、科研交換工作。中國政府如有條件，可以不以常駐的形式，邀請他們定期來華開設系列講座、課程”。

“中國有很好的人文氛圍。”沙德洛夫眼中的中國，有着友好和諧的科研大環境，還有年輕學生求知的情緒。一年中，他有6個月在中國，剩下的時間回俄羅斯完成同類的科研工作。

家人的鼎力支持是沙德洛夫堅實的后盾。美麗的女兒為其擔任工作秘書，在中國長期陪伴。不久之後，現為大四學生的外孫女也將來華，協助網絡方面的工作。

目前，沙德洛夫在北航開設《有限元方法引論》課程並主持科學計算前沿研究生討論班。經歷一年半的學習，他已對指導中國學生駕輕就熟。“他們非常友善，臉上總是帶著‘小太陽’一般的微笑。”課下，學生們常來幫忙料理一些生活上的問題，如購買電話卡、調試網絡；沙德洛夫隨時為學生們解答各種學習問題，父女倆還常以俄羅斯特有的小禮物相謝。

沙德洛夫很欣賞中國學生勤勞刻苦的學習態度。“在人類社會發展與進步時，學生們會對知



沙德洛夫簡介：

國際著名計算科學和信息科學專家，俄羅斯科學院計算模擬研究所所長、俄羅斯科學院通訊院士、歐洲科學院院士，2003年俄羅斯聯邦國家研究獎獲得者，2008年俄羅斯政府友誼獎章獲得者，2011年“加加林金質獎章”、2011年度科學家榮譽獎章。

在多網格有限元方法、非線形雙曲型方程方面有着突出貢獻，領導的俄羅斯科學院計算模擬研究所在大規模科學與工程計算、海量信息數據處理等方面都有着深入的研究。

識探索充滿極大的熱情；可當他們生活在以個人利益為重的“消費社會”里，則呈現截然不同的學習態度。”

“在下一個5年來臨之前，我們應該已經培養出非常好的中國學者，期待他們為世界創造出精妙的東西。”沙德洛夫如是說。

圍繞著學術交流，“學術超市”成為一個以學術會友的平台。有學生表示，在“學術超市”，不僅可以了解其他專業知識，打破思維的局限性，還可以解決當下的一些困惑，真是一個好去處。

沈陽農大：“超市”里“買賣”學問

■本報見習記者 溫才妃

“同學們，大家都吃過白菜，誰能給白菜分類？”沈陽農業大學09級博士章云提問。場下一陣騷動。白菜天天吃，能完整回答白菜種類同學的並不多，一些非農專業同學甚至不會區分大白菜和小白菜。

“這是常見的A基因組蔬菜。”章云展示了6種白菜的樣圖，並開始了當晚的報告——“芸薹屬A基因組蔬菜新種質創制”。循著章云的報告思路，現場觀眾不禁唏噓“原來白菜也能種出這麼多種類”。

這裡不是課堂，而是一個名為“學術超市”的研究生學術交流平臺。這兒不賣白菜，“賣”的是“白菜”背後的學問。

你我身邊的“學術超市”

學術和超市的結緣，緣於沈陽農大研究生院黨委書記張茂仁“創建適合研究生‘口味’的校園文化，鼓勵不同專業的學術交流與碰撞”的初衷。

思前想後，張茂仁想到了與每日生活貼近的超市。“學術超市”把研究生的學術報告當成“貨源”，歡迎同學們到“超市”里選購自己感興趣的學術“商品”，鼓勵更多的同學在“超市”里展示自己的學術成果。除了常规的學術“商品”，“學術超市”還在每月底安排“今日特價”，介紹諸如食品保健、養生美容、家電常識等科普知識。

“品種齊全——學科種類不拘泥於農學，包括研究生教學的各個專業；自由選擇——學生可選擇感興趣的報告，不設置聽課門檻；平價——交流的是學術報告，不需要較高的人力成本。”張茂仁總結了“學術超市”與普通超市的接軌之處。

為了保證“貨源”的品質，防止中斷斷貨，沈陽農大成立了科學技術協會，專門負責“學術超市”的運營。

南區114教室成為“學術超市”的活動大本營。開業前，科協成員張羅著“裝修”，教室左右牆、后牆分別貼上“開源以拓野，交流以彌新”的口號，學術氛圍大為提升。



“學術超市”交流現場

2010年9月，“學術超市”正式開業。迄今舉辦了133期學術報告，每周一、周四晚18:30准時營業。每期設有一個主題，4-6個報告人輪番登台演講，現場觀眾進行提問，最後由點評老師統一指導。

學生報告的科學性該如何把握？負責“學術超市”的研究生院管理辦公室高華老師表示有“三道關”，除了海選時評委考察題目的科學性，大方向主要由學生各自的導師把握、審查，報告現場至少有1位副教授做點評人，糾正報告中的小錯誤，指出不足之處。

科協還根據“80后”、“90后”熱衷“選秀”的心理，定期評選周、月最佳報告人以及年度“十佳報告人”。

百家讲坛式的學術交流

“同學們看到這兩片葉子，你們會提出什麼問題？”點評老師張立軍拿著兩片梧桐葉子提問。

“兩片葉子，一片是老葉，一片是新葉問。”台下有同學不假思索地回答。

“別看這是兩片普通葉子，從植物學方向上

說，老葉和新葉代表了不同發育階段，到底誰的光合作用對樹木的貢獻更大？誰的無機元素含量更多？”張立軍轉動著兩片葉子，“好奇心對科研人員很重要”。

在南區114講台上，小女生可以對蚯蚓的活動習性侃侃而談，絲毫沒有畏懼感。還有人別出心裁地總結了紅樓夢的不同版本、蘋果筆記本的不同肌型，甚至有人登台宣講找男女朋友要義——注重品行和家庭文化熏陶。

“很有‘百家讲坛’的范儿，不是嗎？”植物病理學研二學生王大洲反問。

在許多報告人眼中，“學術超市”提供給他們一個“練攤”的機會。許多博士、碩士干脆把課題論文、畢業論文拿到超市里來“預答辯”。

王大洲就是帶著假期的研究報告登上講台的。當天，他接過主持人話筒，站在靠教室右側的講台原地開講，眼睛還直盯著PPT。點評老師笑著建議他，站到台中間，面朝觀眾，拿著聚光筆解說。

圍繞著學術交流，“學術超市”成為一個以學術會友的平台。農學院小廖正在研究菌根菌，聽說林學院的同學有相關研究，特地前來“學術超

市”請教。一些本科生也加入提問互動中，提早感受到研究生的學術氛圍。

“在‘學術超市’，不僅可以了解其他專業知識，打破思維的局限性，還可以解決研究生當下的一些困惑，真感覺它是一個好去處。”研究生小王如是說。

“開始怕人少，現在怕人多”

“黨員一學期必須來5次。”超市開業初，張茂仁擔心人少，定下了這個規矩。一開始，每期報告僅有50來人參加，不到半年，這個數字不斷上漲，70人、90人、120人……最後僅有189個座位的教室，擠下了210號人。

高華捏了把汗：“開始怕人少，現在怕人多。”據他介紹，為了占到前排位置，17點40分就有人來排隊，18點未到，隊伍已經拐了一個長龍，上了二樓。科協採用了發號碼的方法應對，每期號碼還通過更改字體、添加下劃線等，進行簡單防偽。

不僅觀眾增加了，走上講台的同學也越來越多。臨近期末的一個半月，科協就通過網站、微信、QQ發出海選通知，為下學期“學術超市”“備貨”。出乎意料的是，竟有309名研究生爭相報名，海選不得不分成6天6場進行。

每場海選都是由高華老師和科協各部長親自把關，要求學生們在3分鐘內作簡短展示，重點考察報告的學術分量、報告人的語言表達及PPT制作。

“有些同學特別希望獲得登台展示的機會，不經意間語速過快，或是預備好的PPT沒打開，急得一身是汗。”科協內容部部長梁海霞回憶。最終，197名研究生的學術報告順利入選下學期“商品目錄”。

“學術超市”還吸引了一些老師慕名而來。在第10期報告現場，工作人員在最後一排發現了前來“微服私訪”的自然辯證法老師康貝貝，康老師邊聽邊記，還饒有興致地向同學打聽“學術超市”的情況。

“現在對黨員的要求，改為一學期3次。”高華告訴記者，書記正在琢磨，取消這一硬性規定，同時吸納本科生、青年教師進來作報告。

中國大學評論

落實“大學章程”要從公開化做起

■尤小立

教育部剛剛表态，要將2012年工作的重點放在推動各大學制定大學章程上，馬上就有評論提示，大學章程的關鍵是為了規範權力。這個提示非常地及時，也相當不錯，但只是在說原則。要知道，當下中國的原則已有不少，但執行得好的卻絕對不算多。怎麼走出第一步或者說邁出哪一步，才能讓這種規範和原則不成為空談呢？

幾年前，楊東平教授曾經說，大學是“計劃經濟的最后一個堡壘”，這個定位現在依然適用。由於許多原本是教師或學生個人的事情，像課題申報、职称評定、學術評獎、教學改革和社團活動，現在幾乎全部被納入到各式各樣的行政“計劃”的范畴，於是就有了許紀霖教授說的，只有國家學術，沒有個人學術。而由於所有人都是在“完成工作”而不是依據自己的興趣和特長進行研究、教學，個人的色彩在淡化，个性的因素被消解，個人的空間遭占有，大學里鮮有陳平原教授所怀念的值得傳頌的“故事”產生。

其實，計劃時代是最講原則、最講紀律的，一切以原則和紀律為準繩。但當下中國社會正在日益市場化、多元化，大學的計劃、原則或規範，從文字上看，依舊是條條齊整、內容宏富，可是，計劃、原則或規範的執行者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。在新的執行者這里，過去的原則性松動了，铁的紀律淡化了。往往是學校高層或中層的會議結束的當天晚上，會議的內容便傳播出來——五一十，活靈活現，當然所有的都是未經證實的“小道消息”。有些人甚至會以“小道消息”靈通而獲得某種精神上的滿足感。

“小道消息”在大學里的傳播和流行，說明原來採用的工作方式、工作原則和長期養成的工作習慣已經不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，應該調整和改變了。因為促發“小道消息”產生的正是工作方式的隱秘和政策的的不透明、不公開。

政策的不公開和不透明本身就是政策不科學的一種表現，它既可以引發政策本身的失誤，又可能造成領導與教師、學生這兩個學校主體之間的隔閡。上世紀80年代，大學中几乎所有的教職工都相互稱“老師”，自然親切，或可傳頌。現如今，不僅大學里的行政人員早已習慣於以職務相稱，教師中有職務者，也总是被稱行政職務，甚至連在讀的學生也仿而效之，一口一個“書記”，一口一個“院長”，“主任”地叫。這中間還存有多少情感上的尊重，心底里的欽佩或者說真心誠意，實末可知。

在學里，各種類型的等級正在製造人為的隔閡，隔閡又讓人難以超越等級。這樣循環下去，不僅是在上者不習慣於俯身傾聽，在下者也同样不習慣於畅所欲言。於是，彼此三緘其口，活不投機。不相交流的結果，只能是互不信任、固守領地，自以為是，一旦發生利益衝突必然相互拆台，見對方落水而袖手撻岸，暗自庆幸。

公開不是必然促進交流，但它至少為交流提供了平台或可能性。因為只有公開說明政策的合理性，政策的利與弊，公開政策的制定過程，才談得上協商；只有在協商的前提下，才能有合理的參與，反過來說，只有教師與學生參與到學校的事務中去，學校內部才会有和諧，也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決策中的失誤。

公開化不僅是為了促進政策制定的科學化，而且也是為了有效地監督相關政策的執行。教育部公布的《高等學校章程制定暫行辦法》中明確要求，高校章程必須尊重和保障教師、學生在教學、研究和學習方面依法享有的學術自由、探索自由、營造寬松的學術環境。這種符合國際慣例和中國特色的要求已有先例可循，制定起來並不困難，難的是具體工作中是否能夠處處體現，事事按照章程執行。這就需要切實地公開程序、公開操作、公開結果，只有在相應的範圍內予以公開，執行到到位與否才可能評判，也才談得上監督。

公開化無須動員，無須另設機構，無須財政追加撥款，無須增添設備，無須增加空間，一句話，它是既簡單易行，又能保證“大學章程”在公平、公正原則下切實地制定和有效地執行的。大學改革只有從最簡單和最有意義的方面做起，才能體現出大學的風範和知識的力量，也才能避免政策或章程僅僅停留在文字和言語之上的尷尬。